

## 文化

## 额尔古纳：

## 一个新型的文化边区

唐戈

【内容提要】通过对额尔古纳这个新型文化边区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受国家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该文化边区呈现出一些与历史学派人类学家笔下的文化边区不同的特点。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俄东段边界地区的博弈和较量，最终使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一，从而使汉俄文化东部边界之大部分消失，最后存留下额尔古纳这一小块汉俄文化的边区。

【关键词】额尔古纳地区 文化边区 国家因素 汉文化 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1) 04-0061-11

## 一、关于“文化边区”的概念和理论

历史学派是人类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派，该学派无论在民族文化的实证研究上，还是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都有着十分突出的贡献，文化区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之一。

“文化区”概念最早是由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提出的，后经其学生，特别是威斯勒的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并进而上升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文化区”概念与德奥传播学派提出的“文化圈”概念有些类似，但又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化圈’学说强调类似文化特征，而不要求有连续性的区域范围，那么‘文化区’则要求在一个共同史地单位区域内”<sup>①</sup>。

在提出并阐述有关“文化区”概念的基础上，历史学派人类学家进而又提出“文化中心”和“文化边区”两个概念。与文化中心相比，文化边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前者即是指在一个文化区内表现其文化特征最浓厚的中心地区，而后者是在一个文化区内远离文化中心，表现其文化特征较为淡薄的边缘地区”<sup>②</sup>。其次，“在任何文化区域，文化特质都趋向于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所以，那些在外围发现的文化特质较为古老，而在中心区域发现的文化特质则是较新的”<sup>③</sup>。第三，文化边区“是一个文化区与另一

①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第90页。

③ [英] 艾伦·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修订版）》，王建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唐戈，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个文化区之间的过渡区域，它的文化内容，由双方混合而成”<sup>①</sup>。每一个文化区都有其边界，对于两个相邻的文化区来说，它们各有各的边界，但对于文化边区来说却只有一个，两个相邻的文化区共有一个边区。

现在让我们将文化边区的第三个特点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

我们知道，文化区理论是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基于对北美各印第安部落文化的实证研究而提出来的，他们将分布于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划分为若干区域，即“文化区”，其中每一个文化区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在地域上相邻、在文化上具有某些共同特质的印第安部落。

北美各印第安文化都是所谓的部落文化，都没有建立国家。如果相邻的两种文化都已建立了国家，那么这样的文化边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又会具有哪些特点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额尔古纳这样一个新型文化边区的解剖，来探讨这一问题。

## 二、关于额尔古纳地区

额尔古纳地区作为一个文化边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具体指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原额尔古纳右旗）。

额尔古纳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该地区西面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原称赤塔州）隔额尔古纳河相望，具体说是与外贝加尔边疆区下辖的两个区，其中位于南部的是普里—阿尔贡斯克区（简称“普区”），位于北部的是涅尔琴斯基扎沃得区（简称“涅区”）相邻。其东北部是黑龙江省漠河县，东部是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原额尔古纳左旗），东南部是牙克石市，南部是陈巴尔虎旗。漠河、根河和牙克石中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北段，传统上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游猎之地。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北部，是巴尔虎蒙古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游牧所在。

额尔古纳地区就处在这样一个自然和人文环

境的包围之中。其东部和北部属于大兴安岭西北边缘地带，南部属于呼伦贝尔草原北部边缘地带，西部是额尔古纳河河谷。额尔古纳地区南、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其历史和文化也有所不同。北部虽属大兴安岭，但早期的历史发展却与森林开发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淘金有关。南部地处呼伦贝尔草原的北部边缘，适合放牧，位于草原向森林的过渡地带，土层较厚，可从事农耕，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苏（俄）侨所占据，俄罗斯人传统的生计方式恰好就是农牧业结合型。1929年，英国人类学家林德格尔在前去调查驯鹿鄂温克人的途中经过额尔古纳南部地区，她写道：“这片三角洲分布着被俄国人称为‘三条河’的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库尔河<sup>②</sup>，构成整个西北满洲最肥沃的土地。这片辽阔的流域，农业兴旺，山坡上长满了牧群赖以生存的青草。”<sup>③</sup>尽管额尔古纳地区南、北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上述差异，并且二者在历史、文化上也有所不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二者却又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边区，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不同寻常的，包括政治、商业和人种志的边界”<sup>④</sup>。

## 三、边界的跨越与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为汉、俄两种文化分布的边区，额尔古纳地区是包含在整个汉俄文化东部边区之中的，是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一部分。汉俄文化边区共有两部分，其中西部边区位于中俄（苏）西段边界的一段，即从新疆伊犁，经塔城，至阿勒泰一段的中国一侧，东部边区位于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但不包括从中俄东段边界的西部起点至额尔古纳河上游一段地区，因为除了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外，这里是蒙古文化

<sup>①</sup> 戴裔焯：《西方民族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sup>②</sup> 即哈乌鲁（哈乌尔）河。

<sup>③</sup> [英]兰德格尔：《西北满洲与使鹿通古斯》，载吴文衍主编《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黑龙江省博物馆1991年版资料，第142页。

<sup>④</sup> 同上，第142页。

的分布区。而在1938年之前，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则不仅包括从额尔古纳河中游一直到中俄东段边界东部终点的中俄边界中国一侧地区，还包括俄罗斯一侧地区。

根据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将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分为若干小的区域，额尔古纳地区就是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额尔古纳地区包括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它不仅包括作为主体的今额尔古纳市的全部，还包括黑龙江省漠河县的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的东部。而在1938年之前，额尔古纳地区甚至包括额尔古纳河中下游—黑龙江上游两岸的广大地区。

作为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一部分，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始于1882年。这一年有一位鄂伦春族<sup>①</sup>猎人在距离额尔古纳河口不远处的黑龙江漠河为其母亲挖掘墓穴时，无意中发现了大量沙金，这个消息被俄国金商谢列特金知道后，即约请矿师列别金那到漠河采金<sup>②</sup>。从此到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下游中国一侧开采金矿的俄国人越来越多。

1884年俄国人在这一地区设立了“采金事务所”，由谢列特金管理，下设5个区700余个作业组。事务所制定法律，建立武装，征收捐税，设立教堂，俨然是一个国家<sup>③</sup>。到1885年，从漠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吉拉林，采金者已达1.3万余人，其中俄罗斯人9000余人，其余大部分为汉族雇工<sup>④</sup>。

17世纪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曾在包括额尔古纳地区在内的广大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实行“封禁”政策。咸丰年间这个政策被废止，于是大量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开始进入东北地区，出现了“闯关东”的移民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路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河右岸，并被在那里开采金矿的俄罗斯资本家招为雇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葛拉必子金厂已雇有华工8000余人<sup>⑤</sup>。

另有一部分人索性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俄国境内。历史上（1937年前），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左岸地区，即俄国外贝加尔北部地区，也生

活着很多汉族人，他们大都也是被俄国资本家雇佣的金矿工人。1912～1913年，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外贝加尔地区调查北方通古斯人（指埃文基人，即鄂温克人），他看到，在这一地区，“俄国人开设的金矿吸引的汉人比在满洲看到的还要多”<sup>⑥</sup>。

这些被俄国资本家雇佣的汉族工人大都是单身男子，他们中有一部分后来又回到关内老家，余下的部分大都与俄罗斯女子结为夫妻，所生子女即为中俄混血人<sup>⑦</sup>。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血缘和文化的边缘族群，其文化兼具汉、俄两个民族的特点，其产生和存在进一步说明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碰撞和融合之深。

#### 四、国家力量对文化传播的限制与文化传播对这一限制的突破

每一个国家都有边界，即国界，国界附近的地区称边界地区，比边界地区范围大的地区称边疆地区。与文化边区不同，对于两个相邻的国家来说，国界只有一个，而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却有两个，两个国家各有各的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都是政治的边区。

额尔古纳地区作为政治边区的历史早于其作为文化边区的历史。1689年，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成为了中俄两国的界河。但额尔古纳河并没有因此而阻挡住两国人民跨越这条人为的界线而进入对方领土，尤其是没有阻挡住俄国人进入中国领土。1727年（清雍正五

① 这里所说的鄂伦春族可能指驯鹿鄂温克人，新中国成立前，在有很多有关额尔古纳地区的地方文献和民族志里提到的鄂伦春族其实指的是驯鹿鄂温克人。另外当时鄂伦春族普遍实行风葬，而驯鹿鄂温克人由于受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已由风葬改为土葬。

② 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③ 这个“国家”曾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条支流“热尔图加”河为名，称“热尔图加共和国”。参见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263页；盖丽萍：《中俄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热尔图加共和国”》，载《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5期。

④ 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263页。

⑤ 同上，第127页。

⑥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⑦ “混血人”是民间使用的汉语族称，自称和他称都用这个词。俄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词是“米吉斯”。中、俄二字是笔者加上去的，以示与“混血人”为族称的其他族群相区别。

年），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设置了 12 座卡伦，以防止俄国人越界<sup>①</sup>。而到 1882 年，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中国一侧的俄国人大多已被清政府遣送回国。

1882 年之后，清政府同样对于越界采金的俄国人采取了清剿和驱逐出境的办法。例如 1892 年 10 月在清希利沟采金的数百名俄国人被驱回俄境，他们一共留下房屋 23 座、桦皮房 8 座<sup>②</sup>。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这些越界的俄人均被清政府驱赶回额尔古纳河左岸。

在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日本和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交战国，于是额尔古纳河再一次被严密封锁起来，两岸人民的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文化传播也常常突破国家力量的限制。前述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即是突破国家力量限制的结果。

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国家力量的限制再一次被突破。十月革命后俄国人大规模移民额尔古纳地区。据统计，1922 年位于额尔古纳南部地区的室韦县有俄侨 1703 户，共 9279 人，位于北部地区的奇乾县有俄侨 152 户，共 604 人<sup>③</sup>。

移民中国的俄侨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南部，他们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村镇，其中最大的村镇是三河镇。三河因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条支流——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鲁河而得名，从 1917 年到 1976 年一直是额尔古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sup>④</sup>。

十月革命后，移民额尔古纳地区的俄侨中有很多人 是东正教神职人员，而东正教在该地区真正发展起来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921 年，额尔古纳地区第一座东正教堂在俄侨聚居的库利绰维村（今下护林村）建立。1932 年 6 月，圣·斯特列钦斯克—彼得罗帕甫洛夫斯卡娅教堂在三河镇建立。该教堂为圆木结构，是额尔古纳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也是额尔古纳教区<sup>⑤</sup>的中心教堂。日伪统治时期，该教堂领导邻近的包比来、巴尔扎贯、苏沁、卡尔嘎那和拉普沙果尔 5 个村屯的教堂，1944 年拥有教徒约 1800 人。截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额尔古纳地区共建有 21 座东正教堂，其中 18 座属正统派，3 座属旧

教<sup>⑥</sup>。据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监理局统计，1937 年三河教区共有 572 人接受洗礼，其中男 306 人，女 266 人；共有 138 人行终傅礼，其中男 72 人，女 66 人；共有 172 人在教堂举行婚礼<sup>⑦</sup>。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俄侨，但也包括少数中俄混血人。

## 五、国家力量为文化传播开辟道路

国家力量除了限制对方文化在本国传播外，也常常为本国文化在对方领土上的传播开辟道路。

历史上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有几次比较大的潮流，其中有的潮流属民间自发行，例如 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32 年日本人封锁中俄东段边界期间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而有的潮流则借助国家力量，国家力量成为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传播的助推器。这样的潮流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 1900 年，沙俄政府趁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从而为俄罗斯人移民这一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清朝人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庚子之变，俄人乘衅而起，驱逐我华人，焚毁我卡伦，盘踞我金矿，安设水磨，垦种荒地，河中之鱼，山中之草木鸟兽，均一任其取携。”<sup>⑧</sup>

另一次是 1911 年，沙俄政府乘辛亥革命和呼伦贝尔独立之机，再一次占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于是“俄人越界垦茭，复又自由行动”，

①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② 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 126 页。

③ 程廷恒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载于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66 页。

④ 三河镇作为额尔古纳地区的中心城镇一直持续到 1976 年，这一年额尔古纳右旗政府由三河镇迁往拉布大林镇。

⑤ 一般称三河教区，是哈尔滨教区下辖的一个管区。

⑥ 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 13～134 页。

⑦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5 页。

⑧（清）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载李兴盛、王保燕主编《秋笈馀韵（外十八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93 页。

自库克多博卡伦（即四卡，位于黑山头附近）至吉拉林，“移驻我界三百余户，延长三百余华里，宽约五十余华里，大举耕垦，略无顾忌”<sup>①</sup>。

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历史上，除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借助于国家力量外，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也曾借助于国家力量。从1727年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设置卡伦伊始，直到1904年，驻守在卡伦的官兵都是蒙古族。1904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宋小濂就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后，“慨边务废弛，仿古屯田遗制，为实边政策”，将卡伦“增设至二十一卡”，又“以蒙人不习耕稼，一律改用汉人”<sup>②</sup>。

## 六、国家力量在文化边区范围变化上所起的作用

国家力量在文化边区范围变化上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迁离文化边区中本国一侧地区对方国家的人民，肃清对方文化，从而改变文化边区的边界和范围。

俄国历史上曾有多起排华运动。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就受到排挤，其中还包括那些嫁给华人的俄罗斯妇女以及她们与中国丈夫共同生育的中俄混血子女。很多华人和中俄混血人都选择回到中国。

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仅两个月的时间，苏联政府就给一千余华人“发放了赴中国的出境证明”<sup>③</sup>。“中东路事件”之后，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华人和中俄混血人更是大规模地迁回中国。

1931年，由于日本在苏联远东边界地区不断制造事端，苏联政府对生活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和华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此时又有许多华人携妻带子（含中俄混血人）回到了中国。

1932年至1938年间，特别是1937年，大批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和华人，包括中俄混血人被迁往中亚地区。1937年，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法令，18万朝鲜人和8000华人从苏联远东地区被迁往中亚地区<sup>④</sup>。而到达中亚的

华人和中俄混血人又有相当一部分被遣返回中国新疆。据估计，1932～1938年，经伊犁回国的华人（包括中俄混血人）有九千余人，经塔城回国的华人（包括中俄混血人）有一万余人<sup>⑤</sup>。

1938年以后，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已所剩无几。据苏联政府官方统计，截至1979年底，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只有1742人<sup>⑥</sup>。那么，1938年之后，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实际上已经被削掉了一半，而仅仅局限在了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其另一半已不存在。

1954年，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其在中国的侨民，中国政府为此制定了“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并要求俄侨<sup>⑦</sup>分布多的地区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积极协助苏方开展工作<sup>⑧</sup>。1954年和1955年两年，特别是1955年，生活在中国的俄侨，包括生活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的俄侨绝大部分都离开了中国，回到苏联，或者去了某些西方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俄侨的离去，俄罗斯文化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之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消失，唯有额尔古纳地区作为汉俄文化分布的边区存留下来。

## 七、政治因素在文化边区两种文化此消彼长中的作用

### （一）1953年之前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总体环境和俄罗斯文化的强势地位

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之初，额尔古纳地区共

① 程廷恒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载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第2060页。

② 同上，第2045页。

③ 张宗海：《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内部出版）2000年版，第153页。

④ [俄] A. 拉林：《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俄罗斯族简史》编写组：《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⑥ 张宗海：《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第153页。

⑦ 最初移民到中国的俄侨仍然保有沙皇俄国国籍。1924年，中国北洋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居住在中国的一部分俄侨转为苏联侨民（简称“苏侨”），另一部分俄侨不愿加入苏籍而成为无国籍人，称“无国籍侨民”。苏侨和无国籍侨民统称“俄侨”。

⑧ 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有居民 2470 户, 12350 人。其中苏联侨民 1613 户, 9491 人, 无国籍侨民 212 户, 308 人<sup>①</sup>。苏联侨民和无国籍侨民加起来共 1825 户, 9799 人, 占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近 74%, 总人口的 79% 强。其余 645 户 2551 人为中国人, 占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 26% 多, 总人口数的近 21%。而在这不足 1/4 的中国人中, 中俄混血人又占了多数。

1953 年之前, 额尔古纳地区主要有两类村镇, 一类是以侨为主的村镇, 一类是以中俄混血人为主的村庄。以俄侨为主的村镇共有 40 余个, 以中俄混血人为主的村庄有 10 个左右, 只有 3 个以汉族为主的村庄, 不存在以其他民族为主的村庄。

总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 额尔古纳地区的人口主要由三大族群构成, 第一大族群是俄侨, 其次是中俄混血人, 最后是纯血统的汉族人。

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 在额尔古纳地区, 俄侨无疑是强势族群, 俄罗斯文化在这个地区也是强势文化, 这不仅因为占人口多数的俄侨承载着俄罗斯文化, 也因为中俄混血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 甚至一部分纯血统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

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边缘族群, 从理论上讲承载着两种文化, 即俄罗斯文化和汉文化,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俄、汉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 在中俄混血人的身上承载的俄罗斯文化明显多于其所承载的汉文化, 这不仅因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所致, 还因为有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出生在俄罗斯, 并且在俄罗斯生活过一段时间, 之后才移民中国。

由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所致, 某些汉族人, 尤其是那些娶俄罗斯女子为妻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 俄语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际语言。除语言外, 与俄侨通婚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的其他元素, 如“婚礼向染俄俗, 赴喇嘛台结婚”<sup>②</sup>。这里的喇嘛台指东正教堂。

除此之外, 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驯鹿鄂温克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早在俄罗斯境内时, 驯鹿

鄂温克人的文化即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350 多年前他们从俄罗斯勒拿河上游地区迁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sup>③</sup>, 而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族群之间的贸易实现的。驯鹿鄂温克人与俄国人贸易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 直到十月革命前, 驯鹿鄂温克人主要是同俄国境内的商人进行贸易。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移民额尔古纳地区迅速升温。额尔古纳河下游右岸的珠尔干村与俄境的乌启罗夫村隔河相望, 十月革命后从乌启罗夫村逃到珠尔干村的俄罗斯人有 50 多户, 其中就包括与驯鹿鄂温克人进行交易的商人。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珠尔干村的俄罗斯人已达 100 余户, 他们仍然沿用对岸乌启罗夫村的村名称珠尔干村为“乌启罗夫”, 而“珠尔干”的名称则很少被使用<sup>④</sup>。十月革命后中俄边界变得紧张起来, 生活在两侧的人民的越界行为被阻止, 从此与驯鹿鄂温克人进行贸易的俄罗斯商人不再是来自苏境的商人, 而是移民到中国的俄罗斯商人, 并且俄罗斯商人售与驯鹿鄂温克人的商品也不再从俄罗斯进货, 而是直接从中国内地进货。这一时期俄罗斯商人与驯鹿鄂温克人最主要的交易地点就是“乌启罗夫”(珠尔干)。

很多俄罗斯文化特质被整合进驯鹿鄂温克文化中, 其中有一些特质经过了驯鹿鄂温克固有文化的改造, 充分适应了驯鹿鄂温克人的游猎生产和生活。这些俄罗斯文化特质体现在语言(俄语借词)、姓名(俄语姓名)、饮食(如列巴、果酱、酸蘑菇、驯鹿奶茶等)、服饰、宗教信仰、丧葬、婚礼、礼节, 以及造型艺术等多个方面。从宗教信仰上看, 驯鹿鄂温克人既是东正教信徒, “而萨满教的势力也是牢不可拔的”<sup>⑤</sup>。

① 额尔古纳右旗史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 104 页。

② 程廷恒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载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第 2184 页。

③ 吕光天主编:《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载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8~209 页。

④ 同上,第 157 页。

⑤ [日]永田珍馨:《使鹿鄂伦春族》,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人民政府 1985 年版资料,第 8 页。

## （二）移民与文化环境的改变

1954年和1955年，对于额尔古纳地区来说是大动荡、大换血的两年。经过这两年，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和文化的整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一部分俄侨于1954年先期离开了中国；1955年4~6月有苏联侨民1171户共6553人离开了中国<sup>①</sup>；到1959年总共有俄侨1363户8171人离开了中国<sup>②</sup>。侨民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变卖了自己的房产、牲畜（主要是奶牛）和机械。当时额尔古纳旗（额尔古纳市旧称）政府在俄侨较集中的村镇成立了财产处理和牲畜收购点，专门收购上述俄侨无法带走的财产<sup>③</sup>。侨民们赶着三套马车，车上满载家具、服装及其他生活用品，先到海拉尔，再换乘火车，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或者从海拉尔乘火车到达中国某个港口城市，然后再乘轮船抵达某个西方国家。

在迁走俄侨的同时，有计划地从山东和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等地迁来汉、回移民。其中1955年迁来782户，3422人<sup>④</sup>，这其中有从山东泰安、曹县、定陶、禹城和临沂等地迁来的回族419户，1909人<sup>⑤</sup>。

至此，额尔古纳地区族群的整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从1953年的1825户9799人下降到1964年的1户5人（不包括那些已经与汉族人或中俄混血人结婚的俄侨女子）；汉族由1947年的2902人上升到1966年的20089人<sup>⑥</sup>，几乎增加了7倍；1947年回族只有7户37人，1955年移民419户1909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经过1954年和1955年，额尔古纳地区族群结构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作为主体族群几乎化为零，汉族从从属族群上升为主体族群，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族群——回族。族群结构的改变导致文化环境的变迁，1956年以后，从整个额尔古纳地区来看，俄罗斯文化已退居从属地位，汉文化升至主导地位。

## （三）文化环境的变与不变

俄侨虽然走了，但中俄混血人还在。1956年以后，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和文化的整体

环境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某些村庄和某些地区，俄罗斯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宣告结束。

在位于从恩和到七卡的边防公路附近分布着一些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主要包括恩和、朝阳、阳村、正阳和七卡，尤其是恩和。恩和是整个额尔古纳地区，乃至全中国和全世界中俄混血人最大的聚居区，人口超过了1000。这些村庄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

除此之外，额尔古纳地区还有几个类似的亚文化区，其中较大的一个是以吉拉林为中心包括临江村和水磨村在内的亚文化区。

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亚文化区，其中包括以奇乾为中心的亚文化区，以太平村为中心，包括太平镇在内的亚文化区，以黑山头为中心的亚文化区和以上库力为中心包括白音扎拉嘎村和小乌尔根村在内的亚文化区。

尽管1955年之后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回族由于宗教信仰等因素不可能成为中俄混血人的通婚对象，但中俄混血人并没有选择与汉族通婚，而选择了族群内部通婚。尽管额尔古纳地区的大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中俄混血人不愿意放弃俄罗斯文化，从而使俄罗斯文化一直较完整地传承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但从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来看，俄罗斯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几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内。

由于几个俄罗斯亚文化区的存在，自1956年至1966年，俄罗斯文化在汉文化的包围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其重要标志，一是1956~1966年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普遍只会讲俄语，二是这些人出生后不久，都在当地的东正教堂接受过洗礼，从而成为正式的

①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104页。

② 同上，第666页。

③ 王克勇：《苏侨回国记事》，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俄罗斯族百年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④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104页。

⑤ 同上，第134页。

⑥ 同上，第123页。

东正教徒。

当然文化变迁也在悄然进行着：俄罗斯文化逐渐淡出，汉文化正步步逼近，不过这个速度是很慢的。回族文化似乎是游离于汉、俄两种文化之外，并未参与这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

#### （四）中苏关系破裂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1962年，新疆发生了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之后，那些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军队和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即被从这些部门清理出来。

作为清除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文化的一次官方行动，1963年，额尔古纳旗民政部门对该地区的地名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地区的俄语地名更改为汉语名、蒙古语名或鄂温克语名。例如将库利绰维改为下护林，将杜博维改为上护林，将戈拉湾改为恩和，将巴格罗夫改为白音扎拉嘎等等<sup>①</sup>。

#### （五）文化的强迫变迁

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成年中俄混血人都被打成“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内人党”或“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等，被关进了“监狱”。这里所谓的“监狱”乃为当地造反派私设，每一个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都有这样的“监狱”。

“文革”期间，与种族歧视并行的是对中俄混血人文化的强迫变迁。前面已经说过，中俄混血人是俄、汉双重文化的承载者，文化强迫变迁的内容是使中俄混血人放弃其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中俄混血人被禁止说俄语，唱俄语歌曲和跳俄罗斯舞蹈；被禁止吃面包，喝牛奶以及食用其他一切被认为是俄罗斯的食物，甚至被禁止饮酒；被禁止穿裙子，穿紧身裤，冬季被强迫穿棉袄、棉裤；被禁止过俄罗斯节日。

“文革”开始后，额尔古纳地区全部 21 座东正教堂均被关闭，进而被烧毁或拆毁。教堂内及居民家中的圣像被强行取走并付之一炬，很多中俄混血妇女和俄侨妇女偷偷地将结婚那天母亲赠与的圣像藏在了自家屋内的棚顶或墙内。

文化强迫变化的最重要内容是禁止说俄语，很多原来不会说汉语的中俄混血人就是从这时被

迫学习汉语的。文化强迫变迁确实有效，很多在“文革”前十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原来只会说俄语，“文革”开始后被强迫学说汉语，由于年龄尚小，他们很快就忘掉了俄语而学会了汉语。另外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几乎无一人能说俄语，能听懂俄语的人也不多见。

#### （六）俄罗斯文化的复兴

1976年“文革”结束，对于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来说，被强迫进行文化变迁的历史到此为止。“文革”结束后，中俄混血人中又出了一件事，又抓了一批人。但很快这批人就被放了出来，随后是对这一事件以及“文革”期间，甚至“文革”前几年发生在中俄混血人身上的各种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

中俄混血人的文化在复兴，民族意识在复苏。中俄混血人可以在公开场合用俄语交谈了，这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可谓天降甘霖。据笔者调查，尽管从 1966 年“文革”开始那年他们就被迫学习汉语，但是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老年人不能流利地使用汉语，他们所讲的汉语声调不准确。中老年妇女重新穿起民族服装。很多人家重新在自家的院中或厨房内搭起了列巴炉，吃上了“列巴”（即面包）。他们又可以按照本民族的习惯自娱自乐，唱歌、跳舞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东正教。人们首先取出藏在自家屋内棚顶或墙内的圣像，在主室西南角的上方建起了圣像台，每天数次面向圣像台祈祷。星期天的上午或东正教节日，则聚集到某一户人家，举行集体宗教活动。鉴于额尔古纳地区 21 座东正教堂在“文革”期间全部被毁的事实，时任额尔古纳右旗民族宗教局局长的孙秋祥（男，中俄混血人，俄罗斯族）力主在旗政府所在地拉布大林镇兴建一座新的东正教堂。1989～1991 年，各级政府陆续下拨专款共计 13 万元在拉布大林镇兴建了一座新的东正教堂<sup>②</sup>。

该教堂称圣英诺肯提乙堂，位于拉布大林镇南哈撒尔路（原新华大街）的右侧，从呼伦贝尔

<sup>①</sup>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 654～657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44 页。



市市政府所在地海拉尔驱车到拉布大林，最先看到的建筑就是这座东正教堂。但该教堂建成后并未装修，俄罗斯方面捐赠给这座教堂的价值数十万元人民币的圣像和各种圣器，由于手续不全，在运往额尔古纳市的过程中被扣压在俄罗斯旧楚鲁海图海关，一直放在该市驻俄罗斯赤塔州普里阿尔贡斯克区（普区）办事处。直到2009年8月30日，圣英诺肯提乙堂才举行了祝圣和揭牌仪式，从而成为继哈尔滨圣母帡幪教堂、新疆乌鲁木齐木齐教堂、伊宁圣尼古拉教堂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四座东正教堂<sup>①</sup>。

## 八、政治因素在一文化边区内部不同区域间的两种文化分配中的作用

前文已述，1932～1938年，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和中俄混血人曾被迫迁往中亚地区，从而使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俄罗斯一半消失。历史上，在该文化边区的中国一侧也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件，不过这没有导致这一文化边区范围的变化，而仅仅是使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文化边区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总的趋势是使分布在边界附近地区的俄罗斯文化向“内地”迁移。

1929年，中苏在东段边界附近发生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在额尔古纳地区，由于中方兵力不足和装备落后，苏军很快就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几乎所有的中国卡伦，只有毕拉河卡伦的15名士兵在卡官吕瑞甫的带领下坚守达木苏。9月28日，200余名苏军士兵向达木苏发起猛攻，中国将士全部战死<sup>②</sup>。“中东路事件”中发生在额尔古纳地区的战事曾引发生活在这一地区，特别是边界附近地区的人民，包括汉族、俄侨和中俄混血人向“内地”的人口大迁移，民间称“跑反”或“民国十八年跑反”。其中一部分人从边界附近地区迁移到这一地区的“内地”，另一部分人则迁离了这一地区。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额尔古纳地区实行“清边并屯”的措施，强行把分布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八卡、九卡和水磨等村庄内迁，组建新的村庄。

当时生活在这些村庄的主要是中、俄通婚的家庭，前面提到恩和即是其中新组建的一个村庄<sup>③</sup>。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特别是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后，为了“净化边界地区”<sup>④</sup>，中国政府将一部分生活在边界附近地区、具有俄罗斯血统的家庭迁往额尔古纳的“内地”。

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持续到1965年，这一年驯鹿鄂温克人离开了奇乾（即乌启罗夫），离开了额尔古纳这个文化的边区。1965年国家决定将驯鹿鄂温克人集体搬迁到大兴安岭腹地，于是驯鹿鄂温克人赶着驯鹿，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走了两个月，最后于当年9月，在位于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北部的敖鲁古雅河畔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此次驯鹿鄂温克人的移民也与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特别是与“伊塔事件”的影响有关，根据当时政府文件的说法，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

## 九、结论：回到文化边区理论

### （一）对前文的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额尔古纳这个新型文化边区的纵向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受国家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该文化边区呈现出一些与历史学派人类学家笔下的文化边区不同的特点。

首先，由于汉、俄两种文化都已建立了国家，那么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就必然受到国家因素，包括军事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力量（常常是借助于军事力量）会对文化的传播进行限制，阻止其传播，通常是阻止对方文化

<sup>①</sup> 不包括哈尔滨乌斯宾斯卡娅教堂（圣母安息教堂，墓地用）、深圳谢尔盖堂、台北圣三一教堂、东正教普世宗主教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教堂、圣使徒彼得保罗教堂。参见唐戈：《中国东正教的现状》，载《当代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sup>②</sup> 额尔古纳右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第689、834页。

<sup>③</sup> 同上，第21页。

<sup>④</sup> 呼伦贝尔盟公安处边防局编：《呼伦贝尔公安边防志略》，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1991年版，第173页。

在本国领土上的传播,将其阻挡在边界的另一侧。另一方面,国家力量也会为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而文化的传播也常常借助国家的力量,主要表现为借助国家的力量,使本国文化分布到边界线本国一侧,同时借助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突破边界的限制,进而使本国文化在对方国家传播。

其次,政治因素对一文化边区的范围和边界的变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文化边区都有一定的范围,都有其自身的“边界”,但与文化中心相比,由于受国家因素的干扰,文化边区的边界和范围会经常发生改变,而不像文化中心的边界和范围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作为汉、俄两种文化分布的边区,从历史上看,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边界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其范围一直在不断地缩小,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最终缩小至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即本文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再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于额尔古纳文化边区内的两个或多个族群、两种或多种文化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消彼长,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 (二) 进一步的推论

在边界地区,常常发生两个国家的博弈和较量。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博弈和较量更多表现在宗教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俄侨大规模迁离这一地区后,为了填补俄侨撤离后的空缺,国家除了从内地移民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外,还移民部分回族以填补这一空缺。而且回族大都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额尔古纳南部地区,且位处交通要道附近,比如作为额尔古纳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三河镇和位于三河镇以北的库利绰维村(今下护林村)和杜博维村(今上护林村)。

笔者认为,国家移民回族有其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中国政府虽然迁离了额尔古纳地区的俄侨,但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另一个承载主体,中俄混血人还生活在当地。同俄侨一样,中俄混血人都是东正教徒,而汉族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是多神

信仰者。东正教是一神教,具有不妥协性,在一神教与无神论和多神教的交锋中,通常是后者输给前者,在当初俄国母亲与中国父亲结合时,没有一位俄罗斯妇女放弃东正教信仰,倒是有许多汉族男子成为了东正教徒。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同样具有不妥协性,只有它能与东正教相抗衡。

在文化上,两个国家的博弈和较量常常表现为清除本国领土上的异文化,而使本文化传播到对方领土上。如果两个国家势均力敌,那么博弈和较量的最终结果是使文化的边界与领土和国家的边界合二为一,从而使文化边区消失。而如果一国的力量远远大于另一国,博弈和较量的结果则是改变两国的边界,到最后依然是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一,文化边区消失。1858 年和 1860 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中国在军事较量中败给了俄国,中俄东段边界之大部分于是发生了改变。随后俄国用武力驱逐了生活在中俄东段边界俄国一侧的华人,清除了这一地区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文化与国家的边界合一,文化边区消失。

严格来讲,文化边区只存在于像白人到来之前的北美洲那样的地区,那时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各印第安部落都没有建立国家,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界。或者虽然有边界,但由于两个国家都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边界只是理论上存在着”,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文化边区的出现,正如本文所探讨的历史上的汉俄文化东部边区,或作为这个文化边区一部分的额尔古纳地区。

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俄东段边界地区的博弈和较量,最终使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一,从而使汉俄文化东部边区之大部分消失。虽然最后存留下额尔古纳这一小块汉俄文化的边区,但这一文化边区的边界的一段与中、俄两个国家的边界是合一的,而汉文化分布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也是合一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清除俄罗斯文化包括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影响。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伴随着俄罗斯文化在当地的复兴,东正教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建于 1991 年的圣英诺肯提乙堂直到 2009 年才

正式投入使用，其间中、俄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多次的博弈和较量。

在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和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也出现了衰落趋势。以语言为例，现在只有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讲比较流利的俄语。总会有那么一天，俄语在这个地区彻底消失，但东正教还会延续。其结果是中俄混血人成为一个说汉语的信仰东正教的族群。

中国的东正教传自俄罗斯，一直以来以古斯拉夫语作为宗教用语。针对中俄混血人的实际情况，东正教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须作出适应性改变。进入21世纪，哈尔滨的东正教徒率先

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了汉语。2006年7月25日，在额尔古纳地区，在一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圣三一修道院学习的中俄混血青年的家中（放暑假他从俄罗斯回到了中国），笔者一连气向他提了21个问题，他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回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很多东正教徒都不懂俄语，你认为中国东正教是否应该为此作出适应性改变，比如把东正教经典翻译成汉语，在仪式中使用汉语？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只要东正教还存在，额尔古纳这个文化边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而在其背后仍然是中、俄两种文化的博弈和较量。

（责任编辑 李淑华）

## Argun: a New Type of Cultural Border Area

TANG Ge

**Abstract:** Through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a new type of cultural border area Argun, we have found that this cultural frontier area takes on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what anthropologists described. Russia and China played games and had a contest in the Sino-Russian eastern border region, and had Han and Russian cultures integrated into one at last in the most part of the border area and thus had the most part of the Sino-Russian eastern cultural border disappear and finally only left a small part of the Sino-Russian cultural frontier area — Argun.

**Key words:** Argun; cultural border district; national factor; Han culture; Russian culture